

走向“后批判”：西方文学研究的未来之辩

但汉松

摘要：“理论之后”的西方文学研究“该往何处去”，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近年来，菲尔斯基与诺斯对文学研究如何走出方法论和学科建制上的困局都提出了自己的反思。菲尔斯基在深入厘清当代文学批评的缺陷之后，提出摆脱“怀疑的阐释学”并走向“后批判”，以拉图尔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重组文学批评的未来版图；诺斯则以新的文学史分期法为出发点，批判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文学批评的“学者转向”，并在检视了新世纪各种新式文学批评潮流的基础上，为批评范式的转换提出预言。两人看似立场迥异，但对“理论”危机的反思具有对话性，为我们思考西方文学研究的未来道路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批判；后批判；菲尔斯基；怀疑的阐释学；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但汉松，英美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美文学及西方批评理论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10023。电子邮箱：dhs@nju.edu.cn。

Title: Towards “Post-Critique”: A Debate Over the Future of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fter theory”, it is always a heated scholarly issue to debate over the future of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Recently, Rita Felski and Joseph North respectively advance their arguments as to how literary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can overcome its methodological and disciplinary impasse. After a scrutiny of the inherent flaws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Felski suggests that we choose to practice “post-critique” so as to avoid the restraints of 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She is much in favor of Latour’s “Actor Network Theory”, which in her view is a significant new tool to reorganize literary criticism. North’s study starts with a new periodiz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followed by a poignant critique of the so-called “scholarly turn” in literary criticism dominated by neo-liberalism. He concludes with a prediction about the possible paradigm shift of criticism, after reviewing all sorts of new trend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terary studies. The two scholars, in spite of their obviously incongruent positions, offer some insightful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and in doing so they might unwittingly hold an interesting dialogue.

Keywords: critique; post-critique; literary studies

Author: Dan Hansong,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His area of academic specialty include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ddress: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163 Xianlin Avenue, Qixia District, Nanjing 210023,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mail: dhs@nju.edu.cn

21世纪以来，西方文论似乎一直陷于自我终结的危机想象中，关于“理论之死”的讨论不绝于耳。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伊格尔顿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年代早已远去。”(Eagleton 1)伊格尔顿对德里达和福柯等人带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忧心忡忡，认为后现代主义让文学批评

(尤其是文化批评)陷入琐碎化和去政治化，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欲望的空洞、真理的不可能性、主体的脆弱、进步的虚妄，以及权力的无孔不入”(51)。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法国理论”在美国学院中方兴未艾时，萨义德就表达了对文学批评事业的担忧。他发现，

被各种后现代理论武装的批评已愈发专业化和职业化,这种学术研究的对象与“那些阅读报纸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相去甚远”(Said 25),仿佛学者型读者完全栖居在另一个世界里。萨义德此处呼唤的,乃是他一直推崇并实践的“世俗批评”,它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话语游戏,而是关于当下现实事件和社会政治的学术批评。对乐观者而言,理论并未遇到什么致命危机,只是理论曾经蕴含的意义发生了转移。譬如在《“理论”之后的理论》中,艾略特(Jane Elliott)和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反对理论衰亡的“葬礼叙事”,认为理论其实一直在发展壮大,而且在不断挑战“大写的理论”中固有的思想立场(Elliott and Attridge 1-2)。然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美人文学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研究资助、教职岗位和学生人数都在急剧减少,当前西方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理论”的衰败只是这一切更大败相的表征之一。

那么文学理论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学界)到底染上了何种顽疾?其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弗吉尼亚大学的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和耶鲁大学的约瑟夫·诺斯(Joseph North)近年来对这两个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诊断。前者在《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中从现象学的角度切入,审视了当下文学研究界批判至上的主导原则和情感结构,探索了批判之外的替代范式及多元主义原则;后者在《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Literary Criticism: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中则试图延续20世纪20年代剑桥学派的批评理念,呼吁文学研究从书斋中的知识生产转变为对当下现实的干预。虽然两人均未在书中提及对方,学术取向似乎也南辕北辙,但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颇为相似,若以比较的视野观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西方文学研究的未来之路。

一、“批判情绪”之误

菲尔斯基不以政治的光谱来区分当前的文学批评流派,亦不像萨义德那样按照批评家和社会的关系区分“世俗批评”和“宗教批评”,而是将“怀疑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作为理论盛行时代各种文本/文化批判方法的共同指称。所谓“怀疑的阐释学”,是利科(Paul Ricoeur)

的著名术语。利科发现,在现代思想中存在着一一种相似的文本阐释方法,以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这三位“怀疑派”大师为代表,他们的批评任务都是“将隐藏的真相暴露出来,将他人未见的刺耳的、反直觉的意义抽取出来”(Felski, *The Limits of Critique* 1)。利科的术语耐人寻味,他将看似迥异的批评派系归入了同一阵营,依据并非它们的学术观点,而是阐释文本意义时的态度。“怀疑”一词说明批评家和文本之间存在某种不信任的紧张态度,菲尔斯基将这种态度进一步分解为三种批评情感风格,即“警戒”(vigilance)、“疏离”(detachment)和“谨慎”(wariness)。简言之,她认为西方文学批评所倚重的批判正是因为这些情感特质而在学界备受追捧,却也因此陷入故步自封,并导致了理论的危机。因此,菲尔斯基意在讨论她称为“批判情绪”(critical mood)的东西,而非论断具体的学者或学说(*The Limits of Critique* 6)。

曾几何时,批判是西方文学研究中最受欢迎的利器。它作为一种激进的阐释方法,迥然有别于利科所说的“信任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trust),因为后者源于西方的释经学传统,强调读者对于文本(如《圣经》)的忠诚和信任。这里的信任不是盲信,而是接受了批判考验的后批判信任,其信条是“为了理解而信,为了信而理解”(Ricoeur 28)。对于熟稔“批判”的批评家来说,文本是欺骗性的存在,阅读需要克服字面意义的抵抗和瞒骗,深入文本幽暗的深层意义中。于是,“侦探”成为以批判为业的文学评论家的人格面具,他们以怀疑目光去打量文本,成了下意识的职业习惯。一旦先入为主地以文本侦探自居,批评家所做的就不再是“对叙事的阐释”,而是书写“作为叙事的阐释”(*The Limits of Critique* 87)。显然,菲尔斯基借用了海登·怀特对历史解释和情节编排(emplottment)的说法,她认为“怀疑式阅读,简言之,是制造情节的形式,目的是确认原因和指定罪愆”(87)。在这种范式的训练下,越是优秀的批评家,越善于将习而不察的文本视为犯罪现场,其批判总是“在质疑[作者的]叙事时沉溺于[批评家]自己创造的叙事,将各种隐秘的联结勾连在一起,以揭露出暗藏的结构”(*The Limits of Critique* 88)。

“怀疑的阐释学”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

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中有过经典的实践。从奥斯丁、爱略特、勃朗特、到吉卜林、狄更斯和加缪, 萨义德的后殖民“对位阅读”几乎在所有帝国经典作家身上都嗅出了可疑的政治气味, 他们的小说被认为代表了欧洲小说与帝国主义的文化共谋关系。用萨义德的话说, 对位阅读法要求“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必须将之敞开, 不仅发现被写进文字的东西, 还要看到被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Said 67)。在理论盛行的年代, 循此方法的经典研究不胜枚举。譬如米勒(D. A. Miller) 在《小说与警察》(*The Novel and the Police*) 中发现, 狄更斯、柯林斯(Wilkie Collins) 和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 等人的维多利亚小说充当了规训文化的代理, 文学通过虚构想象进入当时读者的大脑私域, 并对日常生活进行警察式的社会管控(Miller 15)。如果说萨义德和米勒是典型的福柯式历史主义影响下的“怀疑的阐释学”, 两人在文本里追踪的是权力和话语的共谋关系, 那么欧文·豪(Irving Howe) 和塞奇威克(Eve Sedgwick) 则更多的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出发, 找出作者潜意识中拒绝承认的政治立场或欲望投射。在前者的《政治与小说》中, 他对康拉德在波兰的童年进行了心理分析, 给这位传统意义上的“反帝作家”贴上了“政治保守主义”的标签(Howe 83 - 86)。塞奇威克则以酷儿的眼光重新检视了亨利·詹姆斯的《丛林野兽》, 认为男主人公充满神秘色彩的恐惧表面上是对异性恋的无能, 但其实潜意识里表征了詹姆斯本人“深柜”的同性恋身份焦虑(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201)。

不过, 菲尔斯基绝不是要全盘否定上述这些美国批评大家; 相反, 作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高理论”氛围下成长的学者, 她一直是“批判”的衣钵继承者, 其早年的女性主义研究力作(如《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和《现代性的性别》) 都可被视为对“怀疑的阐释学”的绝佳实践。她曾长期担任权威期刊《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 的主编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 批评分部的主席, 这也让她一直浸淫在北美以“批判”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潮流中。或许恰恰因为这种局内人的视角, 菲尔斯基对“批判”的反身批判才格外引人瞩目, 也更切中肯綮。她对于批判的不满, 首先是基于“怀疑先行”带来的思维惰性——如果它不是适用于任何情况的阐释方法, 那么过度怀疑将会

造成批评思维的危险惯性, 让我们沉溺于审讯文本, 以期发现无处不在的文本与权力的共谋。菲尔斯基担心“人文学者愈发谙熟于表达‘否定’而非‘肯定’, 那种永恒的警戒心理如果没有制衡, 将会堕入一种自说自辩的自鸣得意中”(Felski, *The Limits of Critique* 9)。显然, 她的诉求是重申理论中批判的限度。在菲尔斯基看来, 理论当前之所以欲振乏力,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们过于熟练地掌握了批判的阐释套路, 以至于总用单一的“批判情绪”来对待文本, 从而生产出大量同质化的、结论先于论证的学术产品。

菲尔斯基并非第一位指出这种研究范式存在问题的人。2003 年, 塞奇威克曾在一篇文章中率先向“怀疑的阐释学”发难, 因为她发现詹姆斯(Fredric Jameson) 所说的“总是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 已然成为当今文学批评中“强制性的戒条, 而不是多种可能性之一”(Sedgwick, “Paranoid Reading and Reparative Reading” 124)。譬如, 20 世纪 80 年代盛行“反恐同理论”(antihomophobic theory) 追寻文本里“同性情色”和“深柜”成为一种学术时尚, 臆想症思维被批评家擢升到一种特权地位(126)。而在非酷儿的批评理论中(如女性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 塞奇威克也发现了这种强制化的律令, 仿佛逼问黑暗真相的臆想症式阅读是批评家唯一的方法工具。同样对学科思维提出整体性质疑的, 还有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为什么批判耗尽了动力?》(*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这篇 2004 年的檄文中, 拉图尔严厉批评了鲍德里亚、布尔迪厄等法国后现代学者, 认为批判在这里变成了“你必须学会怀疑人们所说的一切, 因为他们被真实动机的幻象影响至深”(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229)。拉图尔甚至认为, 在学术界广泛流通的那些术语(如社会、话语、力场、知识、权力、帝国、资本主义) 背后, 体现的其实是和阴谋论者相似的阐释逻辑, 两者都是“从怀疑出发, 然后在黑暗的深处寻找因果解释”(229)。

菲尔斯基继承了这两位学者关于“怀疑的阐释学”的问题意识, 并将问题又推进了一步, 她发现, 怀疑先行的批判在文学阅读中不只是对作者、叙事声音或文本意义系统的深刻不信任, 它还包含了两种关乎空间和时间的预设。就空间而言,

批判往往意味着一种文本的浅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空间结构想象,其隐藏的价值判断是深层意义的特权地位。那么,如何从文本浅层进入深层呢?批判的主要途径是将文本“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或者用菲尔斯基的话说,“批判的存在理由”在于它的“依附状态”(state of dependency)。批评家总是通过文学领域之外的学科话语(如哲学、政治学、历史或心理分析)将文本的符号结构放入更大的框架中加以阐释——而不是像传统的文学批评那样,仅仅满足于在文本的独立系统之内进行审美判断(Felski, *The Limits of Critique* 121)。如此一来,学者的首要任务不是研究文本本身,而是选择一种超然于文学之外的姿态,将其放入产生它们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中,考察文本的生产与接受如何嵌入于当时当地的权力谱系中,解码观念的历史建构性,揭秘文学与时代政治秘而不宣的共谋关系。就时间而言,批判还通常隐藏着一种历史进步的修辞。菲尔斯基发现,批判的实践者通常自认为代表了次级群体(如工人阶级、妇女、(前)殖民地、少数族裔和非异性恋者),而批判的使命就是去帮助这些群体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同时,批判也内化了这样一种政治认识论,即“确信那些不满于现状的人总能比别人看得更深、更远”(141)。很多文化研究虽然不研究具体的他者,却也偏爱讨论某种普遍的、抽象的他性(譬如身份、身体、女性气质、性取向等),并“用以体现一切被压迫的、边缘的、与权力没有共谋关系的事物”(144)。因此,批判的修辞预设了一种“反对”(against-ness)的姿态,阐释者在解读中必然发出对现实的否定之音,“问题化”(problematize)已成为这类批评的膝跳反应。对“批判”的这种现象学还原,让我们看到了它内嵌的几组范畴:“外部和内部,中心和边缘,共谋和非共谋。”(146)不难想象,一旦批评家习惯于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进行文学研究,其认识论将充满独断的危险。

二、从“批判”到“后批判”

既然“批判”的情绪习惯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定式存在问题,那么文学研究是否已走入死胡同?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中,“终结”(Ausgang)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转机和新的出路”(金惠敏 79)。菲尔斯基也反对“理论已死”的说

法,她相信“后批判阅读”(post-critical reading)正是摆脱目前危机的方法。近年来,英美批评界对批判拨乱反正的尝试屡见不鲜——既然批判过于强调政治立场或权力,有人便提出了“审美转向”或“情感转向”;既然批判沉溺于文本的深层阅读,有人便呼吁“表层阅读”或“新形式主义”。然而,菲尔斯基提倡的“后批判阅读”并非简单地背离批判模式,她更希望批评家能够在寻找新的批评范式时克服旧模式的二元对立先设——不能因为深层阅读有问题,就转去推崇浅层阅读;不能因为将文本一味地历史语境化有害,就转而将文学研究局限于文本内部;不能因为批判总是秉持对立的、否定的政治立场,就试图将文学研究一律“去政治化”。从概念史的角度说,“后批判”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由科学哲学家迈克·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中提出来了。波兰尼的书是从怀疑和认知机能的角度,对近代批判哲学作的一次“反攻”,虽然他对普遍怀疑原则的质疑与菲尔斯基非常相似,但后者显然无意于从如此玄奥的哲学知识论层面继承这个概念。菲尔斯基将“后批判”限定在文学批评阐释中,其定义更为简单易懂:“后批判指的是受批判熏陶、但又试图对之进行超越的阅读方法[……]‘后’这个前缀承认了它对所质疑之物的依赖,它介于依赖和差异之间,而不是简单的反对。”(Felski, “Postcritical Reading” 4)简言之,菲尔斯基所说的“后批判”绝不是“非批判”(uncritical),而是打破了“批判”与“非批判”简单对立的文学阐释模式,它从批判的传统出发,但蕴含了更多元的批判情绪,并向各种不同的认识范型敞开。

因此,不妨说菲尔斯基对未来文学批评的期许,是一种更为民主平等的文本阐释系统,这里无论是文本或语境、文学或社会、内部或外部,任何一种变量都没有阐释力上的特权,甚至批评家对于文本也不再充当超然物外的判官或侦探。在新的批评模型中,“深度”的隐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是拉图尔试图重建社会学的一次尝试,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并不存在“社会”与“自然”的分野,所谓的“社会结构”只是学者自身的一种发明。ANT相当于激烈地否定了传统知识社会学对于社会和

历史的本体论,拉图尔甚至希望弃用“社会”这个概念,以更具实践性和开放性的“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取代传统的“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Latour,“Reassembling”9)。在以联结为核心的社会学中,传统社会科学知识论中的各种二元论构建被打破了,社会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认识对象,没有任何独特的现实领域是专属于“社会的”。如菲尔斯基所总结的,社会是“联结的行动和事实,是不同现象的交汇互动,这个过程创造出了组合、近邻、网络。它只存在于实例化中,存在于观念、文本、图像、人和物的相互交合和分开,其方式有时可以预期,有时则不可测”(The Limits of Critique 157)。

菲尔斯基对拉图尔思想的倚重,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学术野心:在对批判的局限完成元批判后,她试图像拉图尔重组社会一样,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起点重组当下文学研究的事业。为什么选择拉图尔呢?原因很简单:她发现批判思维的症结是文本与语境的二元对立,如果像拉图尔那样重新诠释“社会”,文学批评身上的紧身衣就消失了——批评家不再需要像将文学放入历史的“箱子”,并充满敌意地探寻文本的症候。在菲尔斯基看来,发现这些症候的意义,无非是反复证明社会和历史如何决定了文本的生成和接受,而这种带有社会决定论、目的论色彩的批判模式,显然矮化了文学的能动性。在ANT中,文学研究者不再需要在文本、作者、读者/批评家、社会中择其一端,它们都是动态网络中的“行动者”(actor),并无主次强弱之分。这里,拉图尔将“行动者”定义为一种没有尺度大小和复杂性区分的改变性力量,可以是人或非人。通过将“社会”概念敞开,文学的社会性和独立性就不再是对立命题,社会中人与非人的一切皆影响文学的生成,同时文学的语言符号、情节模式、虚构人物、象征隐喻等要素也以“行动者”的姿态参与到网络的流转变化的过程中。既然“行动者”之间地位平等,这自然要求批评家不再以超然于文本的怀疑者自居。

不难想象,菲尔斯基在这里昭示了一种重要的范式转换。当“高理论”的反对者以“重回文本”“重回审美”“远程阅读”等行动纲领去迎接“后理论”时代,菲尔斯基则希望借助看似异端的拉图尔社会学找到第三条道路,让新的文学批评成为新的社会学的自然延伸。用她的话说,“文

本并不独立行动,而是与各种混杂的共同行动者一起行动”(The Limits of Critique 170)。在进一步评价这份未来文学批评宣言的可行性之前,我们应该先知晓这种范式转换将造成的三个观念冲击。首先,以ANT为导向的文学史观将颠覆传统的断代划分,文学作为“行动者”不再囿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辖属,而是具有超越历史主义的潜能。将文学作品仅仅作为历史时代的文化症候的做法,既是对文学的认识矮化,也是对历史进步观念的迷信(154—155)。那种强调语境化的文学批评总是致力于揭示作品在特定历史阶段如何体现经济结构、政治意识或文化模式,而在拉图尔和菲尔斯基看来,历史和文学之间绝不是单向的施受关系。一言以蔽之,文学不是历史的症候,两者应该是相互影响的行动者联结。

再者,“后批判阅读”将重新定义政治。根据传统的文学政治的批判式读法,文本的现象常常被归结于“权力”“宰治”“霸权”“依附”“帝国”“共谋”等政治术语。不过,拉图尔社会学中的政治“不再是去揭示隐藏的力量,并以此解释一切;它是一个在行动者、中介者之间追寻联结、依靠和冲突的过程”(Felski, The Limits of Critique 171)。既然ANT不再以共谋或对抗来描述各方的关系,中介的过程也不引向权力的等级秩序,那么政治在拉图尔体系中也不再是对抗的、否定的,从而消解了批判对文学的怀疑式审查的正当性。文本不是特定历史时空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而批评家也不再是自治自治的意义中心,文学阅读意味着“关联、整理、协商和组合——塑造从前无关之物的链接”(173)。菲尔斯基心仪的正是这种对话和接触的政治,它没有整体的目的(telos),而是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中,迥然有别于左翼批评家追求的革命的、对抗的政治。

最后,菲尔斯基勾勒了一个多元方法论的文学研究图谱。正如她反复申明的,对批判的“批判”并非要革除“怀疑的阐释学”,而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揭示批判中的“例外主义”,破除已被当作规范性的怀疑式批评逻辑。就方法论而言,菲尔斯基并未提出一个可以与批判匹敌的替代方案,她似乎更希望将法国新近复兴的阐释学传统引入英美批评界,并将之作为认识论基础,促使我们意识到不同批评方法之间相互平衡的必要性。ANT更大程度上是在为塑造新的批评意识提供一种原

则指南,而非实践性的操作手册。此外,提倡对批判祛魅并兼收并蓄,其实对于当下美国人文学科摆脱经费匮乏、生源短缺的困境也是有益的。她非常清楚,批判主导的学术生产一方面强调从底层和边缘出发的反体制姿态,另一方面这里产生的批评文本却是精英主义的,其“笨拙的、充斥术语的、学术化的散文”(*The Limits of Critique* 136) 无法被普通大众读懂。改变批判在学院中的一家独尊,倾听非专业读者的声音,扭转专业文学研究与大众的疏离关系,这即意味着对联结的修复,也是 ANT 的题中之义(179) 。

三、“后批判”的限度

菲尔斯基以现象学的方法,对批判的修辞与情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还原,并试图将未来的文学批评建立在 ANT 的基础之上。在她倡导的框架下,文学的独特性和社会性不再非此即彼,偏向语境分析的解读与偏向文本形式的阐释可以共存并相互对话。然而,我们不禁会问:这种后批判阅读是否过于乌托邦?它批判了批判的限度,其自身的限度又在哪里?菲尔斯基承认,ANT 并不完全贴合文学研究,因为前者要求尽可能追踪社会交往中更多的行动者和中介者,而文学研究者往往有一个中心目标,即“训练高阶的阅读技巧,并在与重要文本的接触中加以检验”(*The Limits of Critique* 184) 。文学批评家无法,也不应该成为社会学家(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还是被拉图尔改造过的社会学)。她希望通过“翻译、修补、回避和妥协”(184) 来实现 ANT 和文学研究的结盟,然而具体如何操作,她却语焉不详。罗宾斯(Bruce Robbins) 尖锐批评了菲尔斯基法拉图尔的尝试,认为她并未考虑拉图尔自身的局限性,西方学界对 ANT 一直多有诟病,认为它“将一切原因视为平等,抹除了特定情况下的权力差异,未区分主因与次因”(Robbins 375) 。表面上,拉图尔借用“网络”的反结构化隐喻强调了平等和联结,为文学研究中那种独断的、警觉的批判提供了解毒剂,但罗宾斯担心批评家一旦放弃权力批判,会让批评事业陷入对于正义的无视(375) 。菲尔斯基则反唇相讥,认为文学批评不可能彻底脱离马克思和福柯的批判意识,她做的只是去敲打文学研究中程式化的批评姿态(Felski, “Response”

387) 。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罗宾斯对拉图尔的政治权力观看法是否公允,而是更多地思考“后批判阅读”有意实践的非政治化和反历史主义的主张。准确地说,菲尔斯基并非不要政治,而是不接受左翼批评家心心念念的“解放的政治”,因为真正的解放“不意味着‘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而是‘更好的附着’(*well-attached*)”(*The Limits of Critique* 189) 。无论是性别的政治,还是文学的政治,政治对于她来说从来不是“压迫与被压迫”“解放与被解放”的二元对立,而是要打破专业文学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区隔。同样,菲尔斯基的“后批判”是反历史主义的,她希望从强调历史性的批评模式中后撤,让文学研究像 ANT 所说的那样关注经验中的偶然性变量,放弃结构化的历史阐释执念。不难看出,在批判了“批判”的修辞、情感和方法之后,菲尔斯基的“后批判”也陷入两难之中——不仅方法论上显得颇为含混,而且对文学与当下现实政治(尤其是美国高校)的关系也回避较多,仿佛文学研究的前景仅取决于学者思维方法与风格的转捩。

与这种试图在超历史的维度上讨论文学研究之未来的做法相反,诺斯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恰恰是从历史主义出发,并将火力集中在政治方面。无独有偶,诺斯讨论的也是当下英美大学里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危机。他将“高理论”时代的批评方法命名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historicist/contextualist paradigm*)。这个绕口的称呼与菲尔斯基所用的“批判”一词所指基本相同,都是指 20 世纪 80—90 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但是两人对理论危机的诊断却大相径庭:菲尔斯基选择现象学的方法,从批判自身的秉性出发,考察这种思维与阐释方式如何更容易让批评家沉迷,又如何因其强势地位而在文学研究中走向了僵化乃至独断的危险;而诺斯作为左翼理论的捍卫者,并不认为当下的学科危机是因为“怀疑的阐释学”在批评情绪上存在问题,他虽然认同过度使用历史主义导致了批评的无趣化、机械化,但坚信文学研究的学科危机源于外部力量,并认定该危机是西方左派不断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的历史叙事的一部分。

诺斯在英美文学批评史中析出了“学者”(*scholar*)与“批评家”(*critic*)这两类原型:前者

从事专业化的学术生产,通常将文学文本视为历史文化分析的材料;后者则致力于介入社会变革,将文学阅读的教育当作培养读者审美感受力的途径。这里,诺斯所说的“批评家”是一个狭义概念,他们是以改造社会、开启民智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称为“通才”(generalist)。诺斯认为,“学者”与“批评家”分别对应了“学术”与“批评”两轴,并由此对20世纪文学批评史重新作了一次断代划分。传统的分法通常以1945年为界,将前后分为“战前”与“战后”,但诺斯主张依照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将批评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1914年前后一直延续到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这段时期英美社会“不断被自由主义终结的幽灵所纠缠”;第二阶段从1945年至70年代初,这时期的大环境是冷战,“劳动力和资本达成了凯恩斯主义或福利国家主义的某种妥协”;第三阶段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一直延续到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此为新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North 13)。显然,诺斯毫不掩饰自己的历史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倾向,他将文学研究学科范式演化的进程,工整地镶嵌到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每次变轨中。

诺斯将瑞恰慈(I. A. Richards)及其剑桥学派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起点,也正是由瑞恰慈在第一个历史阶段奠定了“细读”和“实用批评”这两块学科基石。瑞恰慈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左翼的唯物主义美学观,文学批评事业对他来说充满了工具理性,批评家的责任就是“帮助不同物质条件下的读者学会使用文学审美工具,从而培养有实际效用的能力”(North 15)。如果说瑞恰慈是诺斯心目中“批评家”的完美原型,那么第二阶段美国兴起的“新批评”和英国的利维斯则仅仅是继承了“细读”的皮囊,而在精神上背弃了瑞恰慈的唯物主义美学。不仅如此,在冷战的背景下,来自美国南方的“新批评”和主张“伟大的传统”的列维斯带有某种保守主义的文化先设,他们的文学批评不再是培养读者的审美能力,而是帮助读者建立以少数文学正典为主臬的审美判断体系。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菲尔斯基所说的“批判”占据主导地位的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学科范式遽然左转,诺斯称之为“学者转向”(scholarly turn)。在该阶段,传统的西方左派被新左派取代,思想的阵地转入大学校园,“通才”式批评家在英美大学

教职评聘体系下开始进行日益专业化的学术生产,其方法则是“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摒弃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底色的普适文学审美,转而以文学文本为质料,生产历史文化的知识。此刻,雷蒙·威廉斯开启的文化研究事业在英国由伯明翰学派续上香火,美国学者则要么追随福柯或布尔迪厄,要么效仿詹明信去通过“总是历史化”来进行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表面上看,“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在学术界获得主导权,似乎意味着左派文学批评的胜利回归,但诺斯却尖锐地指出,第三阶段的范式转换恰恰表明了“左派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更大的溃败”(3)。诺斯认为,“学者转向”是新自由主义收编美国知识分子的结果,这批人从此进入了象牙塔,与社会大众愈发疏离。他们操练着高深艰涩的学术语言,借助文学文本研究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一方面似乎在思想上激进地解构和拷问着那些被视为“永恒的、本质的、普世的范畴”,但另一方面所做的只是书斋里的革命,激荡出“茶杯里的风暴”,批量制造着一堆无法真正介入现实、干预文化的学术文化史(7)。

由此可见,菲尔斯基和诺斯均不满于文学研究中的过度语境化倾向,但前者在还原式的观察中探查思维习惯的特征,而后者则在外部的历史叙事中找到了病因。诺斯的不满与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表达的立场颇为相似,即失望于文化研究丧失了真正的政治激进性,失望于“学者”仅仅满足于在体制内生产阳春白雪的历史分析(North 12)。简言之,当下的最大问题是盛产“学者”,而根本看不到“批评家”。在诺斯看来,这种变化恰恰与本阶段新自由主义获得的全球霸权地位构成了共谋关系。耐人寻味的是,菲尔斯基几乎一字未提“新自由主义”,她将“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衰落仅仅视为这种理论方法自身的问题(如“批判情绪”)使然。这一方面当然是她故意为之的后历史主义理论取向,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错失了对“批判”之式微加以语境分析的可能。不仅如此,她认为所谓“被驯化的批判”(domestication of critique)之类的抱怨本身就包含了可疑的前提,仿佛批判“曾经是狂野的,未被驯服的”(The Limits of Critique 145)。难道批判就一定要长着“獠牙”,并如狼群一样游走在主流之外?这种以“即将到来的革命”为目的的政

治激进性,是否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这些菲尔斯基敦促读者去质疑的问题,却是诺斯立论的前提。这种分歧是由两人不同的历史观所决定的,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但通过诺斯的历史化批评,我们才更清楚地窥见了菲尔斯基“后批判”的限度。

四、文学批评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文学研究的学科未来。两位学者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不过与菲尔斯基强调理性修补的立场不同,诺斯的问题意识中更带有一种末日论的焦虑。通过清算“学者转向”和新自由主义的暧昧关系,诺斯提醒我们此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捩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资本主义遭受了一系列变故,新自由主义已经陷入衰败,“左派多年来首次有望——无论多么渺茫——停止其长达三十年的溃退,并尝试东山再起”(North 19—20)。在此愿景下,诺斯当然不希望当代文学研究重复詹明信等人文化分析的老路,而是谋求寻找更符合时代变革的批评方法,以“培育[读者的]主体性和集体性”(20)。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菲尔斯基在勾画未来蓝图时始终语焉不详,只是笼统地建议在文学研究中融入当代法国的现象学和社会学;诺斯则更为具体地对新世纪英美涌现的新批评方法作了点评和展望,并带着某种弥赛亚式的革命期待。

诺斯将文学批评的新趋势分为钟摆(Pendulums)、亲近(Intimations)和扩展(Expansions)。所谓“钟摆”指的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审美主义”和“新形式主义”,它们有意站在“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或“批判”的对立面,拒绝将“审美话语”视为文化保守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范畴。在这个松散的群体内部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回归审美是必要的,因为放弃审美的代价是让“本学科困囿于一种猜疑与诊断式的阅读模式之中”,不仅“无法作出明确而缜密的审美判断”,丧失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而且还会让读者无法“与文本的审美愉悦之间建立积极正面的关系”(North 131)。这样的批评与菲尔斯基并无二致,她近年来最关注的学术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普通读者日常文学阅读中的审美愉悦。然而,诺斯

将“钟摆”的隐喻进一步问题化,他发现复兴审美的批评活动往往会再次回到对形式的讨论,“无非每次钟摆复归后‘形式’的涵旨有所变化”(141)。诺斯认为,这种“形式-历史”之间的钟摆带来了一种概念上的僵局,让文学研究无法真正前行,于是只能折返(142)。诺斯悲观地意识到,无论是哪一种形式主义,都无非是在“残留范式”和“主导范式”之间作出选择,依然是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配方勾兑,并不能真正引出文学研究的“新兴范式”,所以也无法让本学科真正摆脱困局(144)。

“亲近”这个趋势与近年来的“情感转向”不无关系,它既不执念于历史,也不过度强调文本形式,而是将重点放在文本和读者/批评家的情感关系上。阐释实践中对于情感的重视,往往是为了有意区别于症候式阅读,同时也强调读者与文本建立的亲密情感关系具有智识上的核心价值。与菲尔斯基一样,诺斯认为塞奇威克关于“臆想症式阅读”和“补偿性阅读”的说法殊为重要,但他更看到了塞奇威克对于替代方案的一筹莫展。塞奇威克一方面承认仅仅暴露隐藏的真相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知识在因果性的建构中会给读者带去怎样的操演性,另一方面却无法明确阐述“补偿性阅读”如何能实践成为一种更好的阐释方法(North 159)。同样,米勒(D. A. Miller)后期也试图重归“细读”,检讨自己早期作品中的福柯式预设,尝试构建更个人化的文学批评,但诺斯却认为这不具有可重复性。诺斯的质疑是基于学科生产机制的物质性。作为年轻的大学教师,诺斯毫不怀疑功成名就的英文系教授跳出经典阐释模式的能力,但他担心如果博士生的论文仅仅基于和文本建立的私密关系,而缺乏严谨的历史语境剖析,那么这些年轻人将注定无法在教职岗位稀缺的英美大学立足(169)。换言之,塞奇威克和米勒脱离主流学术范式的姿态需要以雄厚学术资本为前提,那种“局部的、细节的、非体系化的实践”不可能适用于英美国家的青年学者(Warner 17—18)。菲尔斯基对批判之思维和情感弊端的解析令人信服,但如果“后批判”一直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甚至以反体系化作为自身特色,那么其追随者将很难在当前学术体系中生存。文学研究不只是思维和书写,它同时也是职业化的谋生饭碗,这是诺斯心有戚戚焉的一个物质现实,但显然菲尔斯基

基对此并不关心。

“扩展”作为一种学科趋势,近年来更加直观可感,诸如“跨国”、“全球化”、“世界文学”、“人类世”、“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深度时间”(deep time)、“能源体系”(energy system)等,都是过去二十年里热门的学术名词。诺斯认为,英美学术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扩张的兴奋”(expansion excitement),正是因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制造了壁垒森严的领域细分,从招生、招聘、论文发表到学术院所的设立,无不遵从地域和时间划定的“领域”(North 181-182)。“扩展”是对画地为牢的语境主义的抵抗,但它并不是放弃语境,而是选择更大的语境。这种语境可以是地理空间上的扩展,如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所主张的涵盖世界各个大洲的“世界文学”;也可以是时间范畴上的扩展,如宋惠慈在美国文学中开启的“深度时间”这个架构。然而,诺斯转而批评这些观点各异的设想,尽管“内涵丰富,发人深思”,但更像是“囚徒幻想[……]心心念念的是越狱本身,而不是自由之后的具体规划”(185)。由于这些专门术语是各自为战,缺乏主导范式那种学科系统性,所以只能昙花一现地在学术圈流行,“流行十年左右便不再引人注目,最终被新的流行语所取代”(186)。可以说,“扩展”是一系列由“扩张的兴奋”驱动的、针对过度的语境主义的微型反叛,它们的无力性同样在于未能在学科建制内部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当然,近年来还有“伦理转向”和“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等新的发展方向,它们与前面三种趋势共同构成了对抗“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尝试。可是,无论它们在何种方向上挑战“批判”的规范性,诺斯认为都是局部的、不彻底的,缺乏取代主导范式的系统性。显然,诺斯这里关于范式转换的学科叙事,深受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影响,前者吁求的文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承袭自后者对科学革命的著名分析。但必须谨慎指出,库恩所说的“范式”或“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是科学共同体内高度共享的,指的是“符号概括”(如各种符合、公式等逻辑表达)、“形而上学”、“价值”和具体操作层面的“范例”(如实验室规范、教科书或研究报告)(Kuhn 182-188)。这四个层面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并不能对等复制或简单类

比,人文研究的价值标准(如对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态度)本身也深刻有别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文学批评中是否一定存在科学革命那样的范式转换,这本身亦值得商榷。对菲尔斯基而言,后批判与批判之间不是零和游戏,也不是相互取代的竞争关系,她不期待学科范式的革命,甚至不认为在ANT指导下的文学研究应该决选出某个主导范式。菲尔斯基的立场无疑带有强烈的反精英化和平等主义色彩。既然反对了目的论驱动下某种批评范式的特权地位,那么“越狱”自然也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她首先质疑的是“监狱”的合法性。然而,尽管菲尔斯基对于批判所存在的问题有着更具启发性的多维度分析(而非像诺斯那样仅仅归咎于“学者转向”带来的过度专业化),她对于文学批评所必须寄居的体制土壤却一直避而不谈。我认为,无论是“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也好,或是对批判作了扬弃的“后批判阅读”也罢,在诺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有一点是菲尔斯基不应回避的:英美国家的文学研究依然依托本国“彻底科学化的新自由主义大学”(North 188)而存在,这里默认的是专业知识的生产模式,只要文学研究者选择从博士到求职,再到职称晋升这条道路,就注定无法跳脱这一物质现实。

实际上,在对当前文学研究危机的不同阐述中,诺斯与菲尔斯基殊途同归地看到了同一种未来批评的理想样态。前者将之称为各种“逆势”(dissenting movements)汇集而成的混合物,是一个单数概念;后者则将之称为“行动者网络”中不同方法共存互动的“后批判阅读”,是一个复数概念。两者名字各异,内部结构关系不同,但基本的构成特征却是趋于一致的:

它密切地关注审美和形式;对感觉和情感体察入微,将其视为认知的方式,并把两者看作个体和集体的变化乃至历史变迁的重要决定因素;它牵涉面更广,像通才所做的那样,横跨不同的时期、地域和文化;它愿意将文学用作伦理(或政治的?)教育工具;它不单纯强调文学的诊断作用,也强调文学的治疗作用;它还以一种深刻、严谨,却仍十分直接的方式发挥公共职能。(North 194)

那么,文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决定性时刻,到底是否会发生呢?如果会,何时可以看到?菲尔斯基坚信 ANT 中不同行动者的复杂中介过程,她反对将结构化的规范性加到这个过程中,她的时间观中也并未预设一种革命性的未来;诺斯作为年轻一代的左翼批评家,则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历史的变轨上,既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决定了“学者转向”,并由此带来了积重难返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那么何时革除这个主导范式就取决于新自由主义何时从历史舞台退场。诺斯承认目前外部变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所以当前各种文学研究新趋势(或“逆势”)尚无法汇集成一种真正具有学科属性的批评范式;而在菲尔斯基看来,文学研究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批评家如何反思自身的思维习惯和阅读方式,取决于他们以何种方式看待历史和社会。

最后,这场充满结构性反思的争辩对中国学界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它或许能让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的知识生产进一步祛魅,不再盲从盲信西方文学理论的元话语地位,也不再跟风式地焦虑于“理论之后”的前途路标何在。就像这两位西方学者致力于厘清所在学术共同体的思想谱系和学科危机那样,中国学人是否也应该从自身的文化、历史及学科现实出发,积极叩问和寻求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的机遇呢?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 Elliott, Jane, and Derek Attridge. "Introduction: Theory's Nine Lives." *Theory after "Theory"*. Eds. Jane Elliott and Derek Attridg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 - 15.
- Felski, Rita. *The Limits of Critiqu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 "Response." *PMLA* 132. 2 (2017): 384 - 391.
- . "Postcritical Reading." *American Book Review* 38. 5 (2017): 4 - 5.
- Howe, Irving. *Politics and the Novel*.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 Inc., 1967.
- 金惠敏. 《理论没有“之后”——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说起》,《外国文学》2(2009): 78—80.
- [Jin, Huimin. "Beginning from Eagleton's *After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2(2009): 78 - 80.]
-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Latour, Bruno.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30. 2 (2004): 225 - 248.
- .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iller, David A. *The Novel and the Pol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North, Joseph. *Literary Criticism: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Ricoeur, Jean Paul Gustave. *Freud and Philosophy: 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 Trans. Denis Sav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Robbins, Bruce. "Not So Well Attached." *PMLA* 132. 2 (2017): 371 - 376.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Sedgwick, Eve Kosofsky.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 "Paranoid Reading and Reparative Reading."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3 - 151.
- Warner, Michael D. "Uncritical Reading." *Polemic: Critical or Uncritical*. Ed. Jane Gallop.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3 - 38.

(责任编辑: 王嘉军)